

论梁代诗人萧综

邬国平

内容提要 萧综名义上是梁武帝次子，其实是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这种特殊的身份，迫使萧综长大以后选择了一条叛逃梁朝的道路。他内心充满仇恨，需要通过反抗来安抚心灵，而性格中又不失单纯、纤柔的一面，一旦感动又转而追悔自己的卤莽。在萧氏家族中，萧综是独特的一员。从他敏感的心理萌芽的诗歌充满对身世和家国透彻骨髓、深切入微的感受，它们仿佛是诗人从灵魂里发出来的声音，而这在萧氏家族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是读不到的，在南朝诗苑它们也堪称别具一格。本文通过辨析史书对萧综生平和诗歌的记载，勾勒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特异的诗人类型。

关键词 萧氏家族 萧综 《悲落叶》《听钟鸣》

一 史家笔下两个萧综

南朝梁与北魏是敌国，经常交战，双方将领逃来逃去的事常有发生。萧综母亲吴淑媛原是齐东昏侯萧宝卷妃子，梁武帝萧衍打败萧宝卷后，归属于梁武帝，七个月之后萧综出生，所以他名义上是梁武帝第二子，实是萧宝卷的遗腹子。南齐被梁取代后，一部分王室成员逃亡到北魏去求生存。萧综在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以后，于525年利用一次机会叛逃到北魏。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萧综在两朝史书里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双方史家记载的萧综，都刻意突出了他精神、生活和遭际的不同侧面，读罢双方的叙述，有时竟让人觉得他仿佛是两个人。参观敌国的史书，每见遇到这类情况双方都总是锱铢必较，一丝不苟。这是史家所怀不同的国家意识所致^①。

读过《梁书》、《魏书》、《南史》和《北史》的萧综传后，不难获得这样的印象：《梁书》、《南史》详于萧综在梁朝时的经历，《魏书》、《北史》则详于他入魏以后的遭遇。然而假如以为只需要将《梁书》、《南史》所载早期的萧综与《魏书》、《北史》所载入魏以后的萧综拼接起来就是这个人物的全传，那就想得太简单了。事实上，对于入魏以后的萧综，对立国的双方史家各自精心选择他不同的侧面予以叙述，有的互相矛盾，是无法简单拼接的。史家们借此留给世人和历史一段微言大义。

下面试举数端事实，予以说明：

一、《梁书》萧综本传题作《豫章王综》，不仅使用他的本名，而且名前还冠以梁武帝给予他的封号。而《魏书》的本传附见于《萧宝夤传》之后，传的题目为《从子赞》，显豁表示他与早先降魏的萧宝夤是叔侄关系（萧宝夤是萧宝卷同母弟），这样就将他与梁武帝的父子关系给消解掉了；萧综降魏后改名赞（一作纘），《梁书》、《魏书》所记人名不同，使双方尊仰本国的政治意识在这些地方毕露无遗。

二、对于萧综入魏的主观动机，二书的叙述也不一致。《梁书》本传说：“闻齐建安王萧宝夤在魏，遂使人入北与之相知，谓为叔父，许举镇归之。会大举北伐，六年，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综都督众军，镇于彭城，与魏将安丰王元延明相持。高祖（即梁武帝）以连兵既久，虑有衅生，敕综

^① 这里所讲的“史家”，主要是指《魏书》、《梁书》、《南史》、《北史》原始史料的作者。

退军。综惧南归则无因复与宝夤相见，乃与数骑夜奔于延明。”在这种委曲的叙述风格之下，萧综入魏的动机被解释成似乎是出于“投亲”而不是“叛国”。《魏书》本传则说：“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萧衍……肃宗遣安丰王延明、临淮王彧讨之，赞便遣使密告诚款……夜出，步投彧军。”^①《岛夷萧衍传》也说：“及大军往讨，综乃拔身来奔。”^②直截了当地道出，萧综是向魏国军队投诚。

三、《梁书》和《南史》本传记载萧综在魏朝的生活经历甚略，却又断言：“综在魏不得志。”^③《魏书》本传适相反，尽力突出萧综在魏朝所受到的宠遇，说他入魏，“赏赐丰渥，礼遇隆厚”。又叙说他与魏庄帝姊寿阳公主成婚，公主对他忠贞不渝，等等。

四、《南史》本传记载萧综入魏后，当梁朝将领陈庆之护送已经归顺的魏北海王元颢还北，一度攻入洛阳时（529年）^④，曾写信请求回归南方。“陈庆之之至洛也，送综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综小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⑤将“送综启求还”一语与《资治通鉴》“陈庆之之入洛也，萧赞送启求还”的记载合观，其意思就更加清楚：陈庆之将萧综请求重新回归梁朝的信送交给了梁武帝。武帝果然令使者给萧综寄去他小时候穿用的衣服，示以亲情和思念，实际上是通过旧物向他传递接纳的心愿。这件事情后来因为魏国军队很快收复洛阳而没有实现。然而，《魏书》和《北史》对此事都付诸阙如。

五、对于萧综之死，《梁书》和《魏书》的记载更是大相径庭。《梁书》本传说：“大通二年（528），萧宝夤在魏据长安反，综自洛阳北遁，将赴之，为津吏所执，魏人杀之，时年四十九。”这条材料不仅告诉人们萧综的死因是追随其叔萧宝夤谋反，而且还将萧综的生卒年定为480年至528年。《魏书》本传则另有说法：“及宝夤反，赞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桥，为北中所执。朝议明其不相干预，仍蒙慰勉。建义初，随尔朱荣赴晋阳，庄帝征赞还洛。转司徒，迁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出为都督齐、济、西兖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齐州刺史。宝夤见擒，赞拜表请宝夤命。尔朱兆入洛，为城民赵洛周所逐。公主被录还京，尔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赞既弃州为沙门，潜诣长白山，未几，趣白鹿山。至阳平，遇病而卒，时年三十一。”《魏书》肯定萧综与萧宝夤反魏的事件“不相干预”，说他死于魏国内乱、被赵洛周逐出齐州城以后（萧综被逐时间是530年底，见《魏书·孝庄纪》），死时三十一岁，死因是患病。比较以上两种相异的材料，《梁书》记载粗疏多误而可疑，《魏书》记载翔实，多可采信。萧综是梁武帝第二子，萧统的弟弟，萧纲的哥哥，萧统生于501年，萧纲生于503年，据此萧综的生年可以大致确定在502年。萧宝夤反逆发生在大通元年（527）冬十月，他失败被杀却在530年夏天。《魏书·孝庄纪》、《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纪·高祖武皇帝十》对此皆有明确的记载。萧综既然在萧宝夤“见擒”后为他求情，自己自不可能在528年已经死去。而且这种说法与《梁书·萧综传》载他在陈庆之529年攻入洛阳以后写信“求还”的内容也自相矛盾^⑥。《魏书》说萧综在530年内乱中被逐一年多后病死，比较符合情理。现在已经不清楚《梁书》所据有关萧综死事的史料究竟是

① 《魏书》萧赞本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25页。

② 《魏书》，第2176页。

③ 引自《南史·萧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18页。《梁书》本传云：“综既不得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4页）两书对此的记载完全一致。

④ 陈庆之护送元颢入洛阳的时间，《梁书》之《武帝纪》及《胡僧祐传》、《魏书·岛夷萧衍传》、《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也都作中大通元年（529）。

⑤ 《南史·萧综传》，第1318页。

⑥ 《南史·萧综传》所载与《梁书》不同，《南史》本传说：“及萧宝夤据长安反，综复去洛阳欲奔之。魏法度河桥不得乘马，综乘马而行，桥吏执之送洛阳。魏孝庄初，历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陈庆之之至洛也，送综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综小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未几，终于魏。”（第1318页）以为萧综死于陈庆之败退洛阳（也是发生在529年）以后。此说较《梁书》近实。是李延寿已经发现原来相关的史料记载有误，做了一定修改。

有其风闻的依据，还是纯粹出于南朝史家的虚构，有一点很显然，南朝史家利用离开事实很远的材料叙述“伪事”，其意图是在于强调萧综本人想参与在魏国谋反，最终被魏人杀害。这样就可以为因萧综奔魏而陷于尴尬的梁朝挣回一些面子，对思念萧综深切而感受着痛苦的梁武帝也能够有所交代^①，此外，这样叙述对于梁朝官员来说又不失是一次惩戒，可收发一石而收数鸟之效。

对上面南北朝史家记述的萧综行事等方面的差异，可以简要概括如下：南朝史家笔下的萧综，弃梁入魏主观上是为了投亲，他在魏国不得志，打算重返梁朝，甚至《梁书》以为他最终欲参与萧宝夤反魏之变，为此遭魏人杀害。北朝史家笔下的萧综则是另一种形象：他因为自己的身份而痛恨梁朝，选择向魏国投诚，他在魏国受到宠遇，与萧宝夤反魏事件无关，最后在魏国内乱中遭放逐，因病去世。双方史家记述的差异主要集中在敌国之间的一些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上，诸如投诚还是投亲、有没有重回故国的企谋、是否参与了在魏国的谋反。双方史家皆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在这些问题上态度迥然不同。由此显示出双方史家编撰史书的原则是“隐恶扬善”，目的是长吾国志气，灭敌国威风，故而史书失实的情况在所难免。就萧综的传记而言，北朝史家对以上问题的记述相对在更多的方面接近于真实，而南朝史家相对提供的虚假信息量较大，但是，他们记述萧综在魏国有不得志的经历，一度曾欲返归南朝，这些决不会是无根之谈。《资治通鉴》对萧综的经历有较为详明的叙述，所据材料多取诸北朝史书，同时也酌采南朝史书，对二者参观比较而取其可信者，如叙萧综死事用北朝史书的记载，叙他写信“求还”梁朝则用南朝史书的记载^②，颇有史识。

二 南北朝史家对萧综诗歌的不同态度

“隐恶扬善”既然是敌对的南朝和北朝史家记述史事所遵循的国家原则，那么渗透于史书内容和精神中的这条原则自然可以被当作判断史书某些内容含义的有效依据。比如，某部分重要而可信的内容出现于一方史书的记载而另一方史书却只字不提，对这种现象一般可以理解为，这部分内容所包含的意义对记述的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例如，《梁书·陈伯之传》全文载录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信对于策反陈伯之率部脱魏归梁发生了很大作用，而《魏书》、《北史》都对此讳莫如深。上述《梁书》、《南史》载萧综入魏后曾给梁朝写信请求回归南方，而《魏书》、《北史》却全然不谈此事，也是因为这件事产生的影响有利于梁朝，不利于北魏。当然《魏书》、《北史》不记载萧综写此信的原因也可以从魏人可能不知情，或者虽然知情却难辨其真伪给予解释。这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然而从《魏书》、《北史》只突出萧综在魏国受到优待、从不涉及他在魏期间的不得志来看，指出魏国史家刻意遮蔽了某些不利于他们国家的事实并非悬揣。而从梁朝方面看，史家把萧综写信求归保留为一种史料，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梁朝有利的缘故。

萧综流传下来的诗歌很少，一共二题八首，其中六首载《梁书》本传，《南史》本传提到了二篇诗歌的题目，未载内容，那原因主要是《梁书》记一朝史事，内容无妨详备，《南史》叙四朝（宋、齐、梁、陈）历史，对内容不免删繁从简，而列传部分大量删削的正是所引用的文章。所以《梁书》收录萧综诗歌，《南史》不收，这与修史者对他作品的认识是否有差异没有关系。再看《魏书》和《北史》，二书根本就没有直接提到萧综这几首诗歌，更不用说引录其诗歌的内容。根据本文上面对互相敌对的南朝和北

① 梁武帝最清楚萧综是萧宝卷的遗腹子，可是并未因此对他有任何歧视，甚至可以说，还对他寄予了充分的信任，所以才会对他弃梁入魏感到痛苦和意外。《魏书·岛夷萧衍传》：“衍初闻之，恸哭气绝，甚为惭愧，犹云其子，言其病风所致。”（第2127页）萧综入魏以后，梁武帝仍对他思念殷殷。甚至萧综死后，“吴人盗其丧，还江东，萧衍犹以子，祔葬萧氏墓焉”（《魏书·萧赞传》，第1326页）。故胡三省感叹道：“赞不以帝为父，而帝犹以赞为子，可谓爱其所不当爱矣。”（《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纪十》注，第4796页）

② 详见《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纪九》、卷一五四《梁纪十》。

朝史家出于各自的国家意识、都将“隐恶扬善”作为保存史料和修史的重要原则的分析，自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萧综这些诗歌的内涵必然是有利于梁朝，不利于北魏，这是它们被保留在梁朝的史料中，而未被北魏的官方史料所保存的真正原因。

关于萧综创作二题诗歌的缘起，《梁书》、《南史》本传的记载是：

初，综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大略曰……当时见者，莫不悲之。（《梁书》）

初，综在魏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以申其志。当时莫不悲之。（《南史》）

二书皆把萧综的二题诗歌视为他在魏国“不得志”的抒情之作。《梁书》、《南史》萧综本传虽然没有记载他在魏国如何“不得志”的具体事实，却通过他创作的这些充满不快情绪的诗歌让人联想他的境遇，这作为一种撰写人物传记的方法，也自有其巧妙之处。后人受《梁书》、《南史》上述记载的影响，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永乐大典》卷八〇七录有诗话四十九条，其最后一条说：“萧综叛奔魏，在魏不得志，作《听钟鸣》、《悲落叶》以自悼。”^①可见后人接受了《梁书》、《南史》关于萧综写作二题诗歌原因的说法。相对而言，北朝史书根本不谈萧综在魏国“不得志”的事实，也不直接提到他表现这种心情的诗歌作品，就显出了史家遮遮掩掩的修史心态。根据后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所载，萧综的诗歌（至少是其中的《听钟鸣》三首）在北朝是有流传的：

龙华寺，宿卫羽林虎贲等所立也，在建春门外阳渠南。寺南有租场。阳渠北有建阳里，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

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太后以钟声远闻，遂移在宫内，置凝闲堂前，与内讲沙门打为时节。

孝昌初，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歌》三首，行传于世。^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洛阳伽蓝记》：“武定五年（547），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摭拾旧闻，追叙故迹，以成是书。”^③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与萧综在魏生活仅相隔一二十年，其云《听钟歌》（即《听钟鸣》）“行传于世”，当可信。然他以为萧综创作《听钟歌》三首是由于他对洛阳寺钟声感到好奇，这未必有据，也未必可信，因为《听钟歌》强烈抒愁的主题与杨衒之所谓的诗人好奇心难以联系到一起，故杨衒之对萧综创作《听钟歌》原因的概括，其中当是包含着北人的一种忌讳，或者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意识的反映。尽管如此，《洛阳伽蓝记》记述了萧综这三首流露愁绪哀意的诗歌，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他在北魏曾经经历精神苦闷和不快的事实，这也证明了北朝史书避而不谈有关情况实为刻意地掩饰，表明在这个方面它不足以构成信史。

今人关于《梁书》所载《听钟鸣》三首另有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它们不是萧综在北魏写的，而是作于梁朝。理由是，“其中有‘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的句子，可见此诗作于梁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因为萧综二十三岁投奔北魏，而他在洛阳仅生活了八九年光景”^④。还有一种意见则将史书关于此诗作于魏朝的记载和“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域”句加以综合，提出“颇疑《听钟鸣》、《悲落叶》二诗皆作于梁，入魏后改作重订”^⑤。然而，为什么不可以将这二句诗理解为是身在北魏的萧综对自己往昔二十余年金陵生活的追念呢？其实这正是《听钟鸣》三首诗重要蕴涵之所在，也是《悲落叶》三首流露出的强烈心声，萧综所以会做出向梁朝写信请求回归故国的冒险举动，正是这种追念南朝的

① 《永乐大典》卷八〇七所录诗话，也被称为《南北朝诗话》，不著撰人，内容也不全。据钟仕伦推测，“《南北朝诗话》的成书时间，其上限当不会超过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其下限恐在宋末元初”（《南北朝诗话校释·前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页）。本文引自杨家骆主编《历代诗史长编》之《南北朝诗话》，台湾鼎文书局1971年版。

②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二《城东》，第72页。

③ 永瑒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9页。

④ 吴锦撰萧综《听钟鸣》鉴赏文章，见《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4页。

⑤ 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史料丛考》“萧综《听钟鸣》、《悲落叶》”条，第584—585页。

思绪白热化的一次爆发。史书对萧综向南朝写信“求还”记叙得很简略，使人仿佛觉得这与他全部的行为毫无必然联系，然而，若联系萧综这些诗歌，就不会觉得他采取这种行动有什么突兀，也不会对此感到困惑和费解。所以对于梁朝和北魏双方来说，《听钟鸣》等诗歌无疑是带有政治敏感性内涵的作品。《洛阳伽蓝记》用“闻此钟声，以为奇异”来概括诗人的创作缘起，已是有意地从这一敏感问题上转移开去的表现，而其诗被南朝史书著录，北朝史书却不录，态度迥然不同，正是敌对国双方史家因该作品的敏感性内涵而做出的必然反应。若是萧综创作于梁朝，就无法合理解释这两组诗载于南朝史书而不载于北朝史书的现象。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魏书》萧综本传出现下面一段话不再是蹊跷的事情。传云：“赞（即萧综）机辩，文义颇有可观，而轻薄倜傥，犹有父之风尚。”（按《北史》萧综本传同）这是该传唯一的一处讥责萧综的文字，批评他文风“轻薄倜傥”，继承了萧衍的“风尚”。史家为什么突然插入这一句贬责萧综文风的话，而且将它与萧衍的“风尚”相联系？其意是否隐含对萧综包括《听钟鸣》、《悲落叶》在内的作品的否定？目前由于资料不足，还无法肯定，但是对其可能性也不能轻易地排除。若真的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则北朝史家看似没有直接提到这些诗歌作品，其实还是隐蔽地对《听钟鸣》等敏感的作品表达了自己明确的态度。

三 萧综《听钟鸣》、《悲落叶》的抒情性

萧综《听钟鸣》、《悲落叶》实在是写得很出色的诗，在当时诗坛是绝少见的作品，可是我们的文学史不会去提及它们，今天的读者对这些作品几乎一无所知似乎也证明了它们已经被遗忘。后世流传的《听钟鸣》、《悲落叶》皆有繁简两种文本，《梁书》萧综本传所载二题，每题各三首，是简的；《艺文类聚》卷三〇、卷八八所载同样的二题，各一首，是繁的。对于二题繁简文本的关系，明人梅鼎祚曾经指出，《梁书》所载二题均非全文，仅是原文大概，《艺文类聚》所载则是全篇，其中《悲落叶》可能由原来不同的二篇组成^①。《梁书》引萧综诗既曰“大略”，其非全本的可能性大，梅鼎祚意见可从。然《艺文类聚》所录二首繁本《听钟鸣》、《悲落叶》更可能是对两组简本诗歌整合、改编而形成的，简繁本之间并不构成简单的并列关系^②。这样看来，我们今天读到的萧综八首诗歌经过改编的二首好像是完整的，其他六首都存在句子阙失的现象。这固然令人遗憾，然而对于一些历史颇久的作品来说发生这类情况也属无奈。古代的诗歌作品出于各种原因被人作了删节，以不全的形式进行流传而得到接受者承认的情况在文学史上也是常见的^③，因此我们仍然不妨将萧综《听钟鸣》、《悲落叶》当作“完璧”来接受，感受诗人情绪的悲重，格调的忧郁。

① 梅鼎祚编《古乐苑》卷三八：“按《梁书》二辞各三首，似与《记》（引者按：指《洛阳伽蓝记》）合，但存其略耳。《艺文》、《诗汇》所载与《书》颇异，今附于后。”又于附录《听钟鸣》曰：“此或《听钟鸣》全篇之一。”于附录《悲落叶》曰：“此至‘高下任飘颻’，或是《悲落叶》全篇之一，后云‘悲落叶，落叶何时还’，或别一篇。”（明万历刻本）按《诗汇》指明张谦辑、王宗圣增辑《六朝诗汇》，所收萧综《悲落叶》也来源于《艺文类聚》。

② 如《艺文类聚》所载《听钟鸣》“当知在帝城”、“翩翩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半夜鸣”，分别出自《梁书》所载同题第一首“当知在帝城”、第二首“飘飘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艺文类聚》所载《悲落叶》“悲落叶，联翩下重叠。重叠落且飞，从横去不归”、“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又是出于《梁书》所载同题第一首“悲落叶，连翩下重迭。落且飞，从横去不归”、第三首“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凡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根据这些集诗的痕迹，可以将《艺文类聚》所载繁本二题看作是在《梁书》所载诗篇基础上的一次再创作。而进行再创作的诗人是萧综本人，抑或是别的人，现在已难考证。在找到可供证伪的材料以前，我暂拟将萧综视为进行再创作的人。

③ 如晋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整篇十句，自唐朝以后，该诗就普遍以四句体的形式流传着。类似的例子很多，可参考郭国平著《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8页。

先看《听钟鸣》四首：

听钟鸣，当知在帝城。参差定难数，历乱百愁生。去声悬窈窕，来响急徘徊。谁怜传漏子，辛苦建章台。

听钟鸣，听听非一所。怀瑾握瑜空掷去，攀松折桂谁相许？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飘飘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夜半啼。

听钟鸣，听此何穷极？二十有余年，淹留在京城。窥明镜，罢容色，云悲海思徒掩抑。（以上据《梁书》）

历历听钟鸣，当知在帝城。西树隐落月，东窗见晓星。雾露眇眇未分明，鸟啼哑哑已流声。惊客思，动客情，客思郁从横。翩翩孤雁何所栖？依依别鹤半夜鸣。今岁行已暮，雨雪向凄凄。飞蓬旦夕起，杨柳尚翻低。气郁结，涕滂沱，愁思无所托，强作听钟歌。（此据《艺文类聚》卷三〇“人部十四·别部下·怨”类）^①

周一良先生说：古代“寺院报时早用钟而暮击鼓，因有晨钟暮鼓之云”。并引庾信《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诗“山寺响晨钟”、张公懔《隋龙藏寺碑》“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以为寺院早晨用钟报时之证^②。萧综《听鸣钟》“历历听钟鸣，当知在帝城。西树隐落月，东窗见晓星”，正是以夜尽晨临之际寺院的钟声为抒情的引子，自画了一幅失眠者因痛苦而不安的灵魂。诗人笔下的钟声凄清哀戚，徘徊不绝，诗人的心灵也像钟声幽眇地悬于依然罩着夜色的苍穹，绵绵延延，无法平静。他为何百愁丛生？是自感犹如禁苑里“辛苦”打更报时的“传漏子”（小官吏）地位而心理失衡，是对自己“怀瑾握瑜”的才华得不到尊重，无缘“攀松折桂”的郁闷，他真切感受到寄人篱下的滋味，这也就是《梁书》、《南史》本传所谓的“不得志”。同时，这种愁也是诗人抒发与“昔朋旧爱”天各一方孤独的痛楚，萧综带着仇痛离开了梁朝，然而他母亲、妻子、儿子不能随他同来北魏，不能来的还有为他所信赖的其他亲友，所以不妨说他又将自己的爱留在了江南，当他以北魏的边缘人角色咀嚼品味生活时，这些爱成为他心灵的最忆，毕竟那是他烙着“二十余年”生活印记的故乡。《艺文类聚》所载之《听钟鸣》径用“客情”解说“愁思”的具体内涵，而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将它归入“（离）别”部的“怨”类，都是对它很准确的概括。任昉《赋答陆倕知己赋》：“咨余生之荏苒，追岁暮而伤情。测徂阴于堂下，听鸣钟于洛城。”与萧综的深情唱叹相比，就显得浅泛了。

再看《悲落叶》：

悲落叶，连翩下重迭。落且飞，从横去不归。

悲落叶，落叶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凡（一说“夙”之误）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以上据《梁书》）

悲落叶，联翩下重叠。重叠落且飞，从横去不归。长枝交荫昔何密，黄鸟关关动相失。夕蕊杂凝露，朝花翻乱日。乱春日，起春风，春风春日此时同。一霜两霜犹可当，五晨六旦飒已黄。乍逐惊风举，高下任飘扬。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各随灰土去，高枝难重攀。（此据《艺文类聚》卷八八“木部上·木”类）^③

古人咏落叶的作品，有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感叹时间、生命流逝，如汉武帝《秋风辞》、曹丕《燕歌行》所咏，陆机《文赋》“悲落叶于劲秋”，陆云《与杨彦明书》“秋风行戒，已悲落叶”，皆是。二是咏唱离别，表达对别后重逢或“叶落归根”的冀望。北朝乐府诗《紫骝马歌辞》：“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隋诗人孔绍安《落叶》：“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

① 《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9页。

②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三国志》札记”之“钟鸣漏尽”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页。

③ 《艺文类聚》，第1509页。

犹言惜故林。”都是这类例子。此外也有将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的，如宋玉《九辩》、刘宋明帝刘彧《步出夏门行》（“商风夕起”）。萧综《悲落叶》是唱叹离别的诗，抒发枝叶一体、落叶归根而不可得的惆怅和郁闷，以及深刻的失落和遗憾情绪，实质是表现他在北朝不得志，寄托思亲望归之情，属于第二种主题的作品。诗篇全用比体，借此使诗歌的义域扩大。诗人利用“下”、“零落”、“飘扬”与“归”、“还”、“相关”二组蕴义相反的词构成张力，其中第一组词义纵横肆行，第二组词义压抑窘迫，一强一弱，映衬借力，有效地醒豁诗意。诗人明知落叶“从（纵）横去不归”，又偏要问“落叶何时还”，状似痴迷昏乱，以此正见诗人内心情切而悲重。这些都使诗篇的感染力增大。

萧综这二题诗歌的主题是抒发哀怨，思念亲情，具有强烈的抒情特征，是属于那种因“气动、物感”而产生的自然、真切的心声，不是为文造情、为诗而诗，后者通常是文人用来打发多余的时间、消遣闲心思的，萧综则是有真情涌动，不吐露他的心灵将遭受加倍的折磨煎熬，所以才嗟叹之，永歌之，缘此其诗歌徘徊俯仰，文情惊蹕。梁朝诗风普遍呈现为清轻纤微，巧琢绮丽，而北朝诗风朴爽简健，气质凝重，双方或文或质，各有偏至。萧综生长于南方，入北魏后又浸习北方艺文风气，他创作的诗歌有声采之美，而又非丰腴没骨，总体特色是辞气相宜，文质相济。如果说“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①是后人对汇通南北文风的一种理想的话，那么，萧综就是在庾信等人之前使南北文风走向融合的一位早期实践者。

无论《梁书》所载的《听钟鸣》还是《悲落叶》，每一题所包含的三首作品，起结有序，意脉贯通，统一于“失意”、“怨愁”大主脑之下，而一首又有一首的情感特征及意义侧重，因此，它们是“有组织”的组诗，与前人偶然合成的组诗有别，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组诗抒情和审美效应。不仅如此，《悲落叶》直接地赓续《听钟鸣》之二“昔朋旧爱各东西，譬如落叶不更齐”，于是，二题诗歌仿佛原来就是一体化的作品，是一个乐章的两个分节。萧综擅长组诗，擅长从整体着眼综联诗与诗之间“大家庭”的关系，这正是他诗歌创造力的表现。《听钟鸣》、《悲落叶》所以使“当时见者莫不悲之”，其组诗形式所产生的艺术感染的合力作用显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四 文学史上一个性格极端复杂的诗人

萧综一生究竟写过多少诗歌，现在不得而知，他流传下来的就是以上介绍的二题八首《听钟鸣》、《悲落叶》。在历史上，他的诗歌还是曾经引起过关注的，在《梁书》、《艺文类聚》载录其作品之后，宋李昉《文苑英华》、明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清人《渊鉴类函》等，或全录或选录了他的作品。不仅如此，后人还模仿他的诗，抒发悲郁之怀。如宋琬被系狱中作《听钟鸣》、《悲落叶》二诗，他在《听钟鸣·小序》里说：“余览北魏诗有萧综《听钟鸣》、《悲落叶》二篇，词甚凄惋。彼以贵藩播越，不失显眄，然尚内不自得，有忧生飘泊之嗟，矧余羈囚，日与法吏为伍？每当宵箭将终，晨钟发响，凄戾之音，心飞魂惊，讎必听猿而涕下，闻琴而累歔哉！岁时晚晚，庭树萎然，爰效其体，以识余之愤懣焉。”^②囚徒身份的宋琬对萧综诗篇产生共鸣，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萧综《听钟鸣》、《悲落叶》二诗蕴意的理解。

史称萧综“有才学，善属文”^③，然而在“才学”方面他可能不会比萧统、萧纲、萧绎兄弟突出，可是，与他们相比，萧综有他自己独特的身份背景和生活经历，他的心理及性情诸因素也与他们不同，这些“内因”与他的“才学”相融合，使他的诗歌成就了一种独异的面貌。

① 《隋书·文学传论》，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② 宋琬《安雅堂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169页。

③ 《梁书·萧综传》，第823页。

萧综小名缘觉^①，体现了信佛的梁武帝对他未来修得佛道的期望。然而，萧综懂事以后一直为他自己的出身深感困扰、屈辱和痛苦，根本没有什么心思学佛，脑里萦绕的全是叛逆之事。《梁书·萧综传》：“初，其母吴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宠衰怨望，遂陈疑似之说，故综怀之。”《南史》对此记载得更加具体：“及综年十四五，恒梦一年少肥壮自挈其首对综，如此非一，综转成长，心惊不已。频密问淑媛曰：‘梦何所如？’梦既不一，淑媛问梦中形色，颇类东昏，因密报之曰：‘汝七月日生儿，安得比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贵，勿泄！’综相抱哭，每日夜恒泣。”从此萧综觉得自己是这个家庭的局外人，因此与周围格格不入，当然他也“为（萧）衍诸子深所猜疾”。王世贞描述萧综的心理，并予以同情的理解，说：“彼梁武，父也，亦父仇也；东昏，父也而疑，奈何？”^②“综事极难处，人至此，岂非不幸耶？”^③萧综因此与萧统诸兄弟对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看到的是人世更多的邪恶。

于是，他开始磨砺自己，将沙砾撒在屋里的地上，终日赤脚在上面行走，以至足下生胝。他练就一身勇力，能手制奔马。他以此作为谋大事的准备。他变得性情酷忍，虽然母亲已经告诉他真实的出身，“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其骨，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日，潜杀之，既瘞，夜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④。这是较早记载的“亲子鉴定”方术，充满荒诞，而萧综为了用这样的方术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血缘，竟不惜杀死亲子，可谓兽性大发，令人发指。他胸口充满复仇的火焰，任南徐州刺史时，下令到处斫伐练树（树名，根叶可入药），因为梁武帝小名练，这绝是匈奴冒顿训练部下以鸣镝射他父亲单于善马的翻版。他终于叛逃了，这是他必然的选择。

怀着仇恨的人是痛苦的，也是不容易满足的。萧综入北魏后对新的现状又开始生厌，他被新的失落感所侵袭，郁郁寡欢。另一方面，从前被他压抑的、不愿正视的梁朝对他亲善的往事却被忆起，被咀嚼，慢慢在他心里变成一种难以抵制的回归的召唤，那里毕竟是他的家，是他的故乡，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梦影。即以梁武帝来说吧，哪怕萧综再任性，再荒唐，甚至在他叛逃以后，除了偶尔、短暂地生生气，对他一直都很宽容。萧综为了自己的血缘身份，感受过人间强烈的仇恨，而在此时，他又啜饮着亲人间的甘美的琼浆。这似乎证明萧综性格仍然是优柔寡断的，这不适合政治，却适合于诗歌，经过大恨又重新燃起爱的火苗，也是最适宜用文学尤其是用诗歌去表现的。叶子飘落了，它还能回到树上吗？《悲落叶》发出的这一声绝唱，是从诗人灵魂里迸发出来的^⑤，在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等人的诗歌里是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他们对世故人情没有这般透彻骨髓、深切入微的感受。

我们现在似乎对“诗人”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固定的概念：他们天资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教养，诗书满腹，锦口绣肠，行事飘逸潇洒，不甘心受束缚，包括来自自己的束缚，因此他们心里是不会有死结的；即便这些都不说，至少“诗人”与凶残、兽性、阴谋、心计等等不相关涉。其实不尽然。诗人都是具体的，他们与常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因此也有可能走火入魔，迷狂从恶，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或许他们的精神比普通人更复杂，心灵比普通人更敏感，因此更容易遭受伤害，但是又总希望

① 此据《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按《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法华经》：“三乘者……二曰缘觉乘。”“缘觉者，悟因缘而得道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第131页）

②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〇“说部”《札记外篇》，王氏世经堂万历五年刻本。

③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一“说部”《宛委余编》六。

④ 《南史·萧综传》，第1316页。

⑤ 后人借鉴萧综《悲落叶》诗，除上举宋琬同题诗外，还有屈大均《梦江南》词：“悲落叶，叶落绝归期。纵使归来花满树，新枝不是旧时枝，且逐水流迟。”（陈永正主编《屈大均诗词编年笺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0页）词人在后半部分假设叶子回到树上，可是此树已非彼树，想到这一层，它便放弃了回去的愿望，甘愿随水逐流。其意也凄婉，却缺少了萧综原诗因灵魂忏悔而悚栗，以及愿望虽然难遂而又不甘抛弃的悲悔力量。

摆脱梦魇，将自己汇入人间纯正的清溪，所以他们常常利用诗歌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以达到精神的涅槃。萧综是一个复杂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憎恨恶而借助恶，决绝之后又对从前怀着依依之情。他使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多样性情，从成分不单一的土壤长出来的花朵，才可能绽放多姿的异彩，诗歌也是这样。

萧综死后六年，即 538 年，吴人将他的尸骨从嵩山葬地盗出，带到江东，交给梁朝，萧衍仍把他视为自己的儿子，祔葬于萧氏之墓。萧综在北魏没有后人。

[作者简介] 郭国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发表过专著《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等。

• 札记 •

萧综生卒年考

萧综，字世谦，后更名为赞，其生平事迹见《梁书》卷五五、《魏书》卷五九、《南史》卷五三与《北史》卷二九。对其生卒年，《梁书》称其死时“年四十九”，《魏书》认为其“卒时年三十一”。后人多据此二说著书立论。我们认为萧综当生于梁天监元年（502）七月，而卒于中大通三年（531）初，时年三十岁。

《梁书》卷五五《豫章王传》与《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附《萧赞传》的记载，皆怀疑萧综为萧宝卷遗腹子。又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龙华寺”条自注云：“综，字世赞，伪齐昏主宝卷遗腹子也。宝卷临政淫乱，吴人苦之。雍州刺史萧衍立南康王宝融为主，举兵向秣陵。事既克捷，遂杀宝融而自立。宝卷有美人吴景晖，时孕综经月，衍因幸景晖。及综生，认为己子，小名缘觉，封豫章王。”（周祖谟校释，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72 页）既然如此，萧综必生于宝卷死后数月之内。《南齐书》卷七《东昏侯本纪》云：“（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国、侍中张稷率兵入殿废帝，时年十九。”知宝卷卒于永元三年（501）十二月。恰在此时，萧衍将其宫人吴景晖据为己有。《梁书》称景晖“七月而生综”，按常人十月怀胎推算，萧综约生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七月。据《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卷四《简文帝本纪》的记载，梁武帝长子萧统生于齐中兴元年（501）九月，第三子萧纲生于天监二年（503）十月，因而其第二子萧综生于天监元年（502）七月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魏书》卷五九《萧赞传》云：“尔朱兆入洛，（赞）为城民赵洛周所逐。……赞既弃州为沙门，潜诣长白山。未几，趣白鹿山，至阳平遇病而卒。”据此可知，在尔朱兆入洛后不久，萧综就于齐州被赵洛周所驱逐，随后其潜诣至长白山，旋即流转卒于阳平。《资治通鉴》卷一五四记载，尔朱兆入洛时间为梁中大通二年（530）十二月初三日。元人胡三省在上引《通鉴》“流转卒于阳平”句下注云：“阳平县汉属东郡，魏晋以来分属阳平郡，隋唐魏州之莘县即其地。”考《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河北道一》“魏州莘县”条注云：“上西至州一百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450 页）又同卷“博州”条注云：“西南至魏州一百八十里……东渡河至齐州二百九十里。”（第 456 页）又同书卷一〇《河南道六》“齐州”条注云：“西南至东都一千二百里……西渡河至博州二百九十里。”（第 276 页）又同卷“齐州亭山县”条注云：“上西北至州九十里。”又云：“长白山在县东北六十里。”（第 278 页）我们据此可以推算出当日萧综流离的总路程约六百多里（即齐州至长白山约一百多里，又长白山至阳平约五百多里）。如此路程，按常人正常的行走速度大概需要半个月时间。另外，齐州与洛阳相距逾千里，尔朱兆攻入洛阳的消息传至齐州至少也得要十数日，这段时间是考证萧综卒年时不应该忽略的。必须指出的是：据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梁中大通二年（530）十二月朔日如果按西历纪年，则已是下一年的一月四日（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74 页）。鉴于此，我们把其逝世的具体时间定在梁中大通三年（531）初。

（葛志伟）